

第十四章 心头郁郁唯情醇(二)

《张伯驹十五讲》
作者 张恩岭

策划 王彦涛 李建成

(接上期)

关于这两种结识情形的说法,究竟哪一种是真的,已无法考证,也无须考证了,总之,他们成了朋友,这本身才是一个传奇呢。二人结识以后,是有走动的,但不多,因为陈毅国务活动多么繁忙啊,张伯驹也不多去打搅,但他们一见倾心,成了知己。在交往中,陈毅知道了张伯驹也擅长下围棋,请张伯驹来家中下过围棋,切磋棋艺。

陈毅的围棋知识和棋艺都很出众,这让张伯驹感到吃惊。陈毅的棋走得非常有力,大刀阔斧,张伯驹行棋飘逸、空灵,不带一丝烟火气。在行棋中,他们的情谊愈加深厚。

1957年,张伯驹被划为右派,就没有再去找陈毅。就这样,4年间,他和陈毅中断了联系。

1961年张伯驹夫妇出关长春,这件事我们在第九章中讲过了。张伯驹去东北之前,陈毅是不了解他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的,张伯驹向他辞行时,他才知道这一切,立即表示要给东北的负责人打电话,让他们照顾张伯驹。虽然真实情况是如此平常,但也能从中看出他们之间的友情,也可以看出张伯驹的为人处事风格。被划为右派,蒙受冤屈,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沉重的打击,而自己的一个朋友则是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,毫无疑问是有能力过问一下这个事情的,可是,张伯驹居然没有向他的朋友陈毅申诉一下自己的遭遇,可见张伯驹的耿直风度,也可看出张伯驹的单纯与善良。

1962年春节前夕,张伯驹从东北回京过年,为了感谢陈毅的关怀,才求见陈毅。春节后,陈毅请张伯驹前去聚会酒叙,并请他代约陪客数人,陈毅则约了齐燕铭作陪。席间,陈毅关切地询问了张伯驹在东北的情况。谁也没有料到,这一次会面竟成了张伯驹和陈毅的诀别。

1966年5月,“文革”爆发,张伯驹受到批斗;9月,张伯驹在北京的家被抄,部分文物被搜走扣押。张伯驹就给陈毅写了一封信,说是家被抄后,已是家徒四壁,将来如何维持生活,还请帮忙相助,等等。但张伯驹当时尚不知,陈毅也受到了“文革”冲击,日子并不好过。

1967年初,所谓“二月逆流”,即“老帅大闹怀仁堂”,与“四人帮”发生公开冲突以后,陈毅处境更加艰难。1967年6月,张伯驹冒着风险又给陈毅写了一封信,表示慰问之情:“公功在国家,尚且被辱,我何足道哉!所指我之罪名,皆是莫须有之事,只可一笑置之!”这封信在“文革”那种特殊时期,没有得到回复。但不管怎么说,张伯驹含泪写的这封信,充满了他对陈毅的敬仰和对陷害忠良的阴谋者的仇恨。在他心目中,陈毅既不是一位高高在上的干部,也不是红卫兵所攻

击的什么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,他就是一个值得依赖的朋友,一种精神的寄托。

从那以后,张伯驹基本上没有再与陈毅有过直接的联系。我们只是从张伯驹1971年写给周总理的信中,可看到张伯驹是这样谈到陈毅的:“党内老辈,我惟识陈毅先生,五七年、六一年两次晤谈,最后皆谆谆以忠于毛主席相嘱……陈先生知我为泽,文化大革命期间,曾致函其于将来代为安排我之生活,现未能见到陈先生,闻其身体欠安,每以为念。”

从这封信里我们知道,张伯驹在时时挂念着他的朋友陈毅。至于社会上流传的张伯驹曾于1971年11月18日给陈毅写一信,信中有“……不想又遇市井小人,恶言相向,立目横眉,未可一世,威风凛凛,骂言咄咄,教人实难苟活”的话,这封信究竟有否,也无可靠资料可查,但口气的确像张伯驹的,这种风骨也正是张伯驹所有的。

这里还有一事,应予说明。即陈毅病中,他的两个儿子昊苏、丹淮要同时结婚。昊苏的未婚妻是秦力生的女儿,而张伯驹的一位好友吴则虞与秦力生的女儿恰住同院。因此,张伯驹知道这一喜事后,便由潘素精心画了两幅梅花,张伯驹题诗后,请吴则虞转送相贺。陈毅见到张伯驹、潘素的绘画,才知张伯驹回到了北京,于是嘱咐夫人张茜再询问一下张伯驹的情况。可惜,这一次张伯驹未能见到陈毅。很快,一个噩耗传来,陈毅元帅去世了。

张伯驹得知陈毅去世的消息,异常悲痛。追悼会前一天晚上,吴则虞告诉张伯驹,请他写一幅挽联,张伯驹略一思索,挥泪写下了一副气壮山河、悲透九霄的挽联:

仗剑从云作干城,忠心不易。军声在淮海,遗爱在江南,万庶尽衔哀。回望大好河山,永离赤县;
挥戈挽日接尊俎,豪气犹存。无愧于平生,有功于天下,九泉应含笑。伫看重新世界,遍树红旗。

此联用典可谓自然贴切,出神入化。上联“干城”中的“干”指盾牌,干和城都比喻捍卫者。下联的“挥戈挽日”,语出《淮南子·览冥训》:“鲁阳公与韩构难,战酣日暮,援戈而撈之,日为之反三舍。”“尊俎”,指古代盛酒肉的器皿,“接尊俎”系从“折冲尊俎”变化而来,指在会盟的席上战胜对方,后泛指外交谈判为“折冲尊俎”。

这副挽联其情之真切,沉哀入骨,而又不乏慷慨悲壮之气,其雄桀激昂的笔力直透纸背,令人顿生振奋、豪迈的情感。

其后,为纪念陈毅,又由夫人潘素画青绿山水《海思图》,伯驹题悼诗于其画上。首尾两首诗为:

痛我长城坏,寒天落大星。
遗言犹感激,老泪忽纵横。
日暗旌旗色,江沉鼓角声。
东南余壁垒,忍过亚夫营。

怕听靡门曲,西州事可悲。
霜筠怜故剑,露薤泣灵旗。
国续褒忠录,人寻堕泪碑。
音容图画里,剩寄海天思。

至于张伯驹的这副挽联是否挂到了陈毅的追悼会上,我们也在第十章中讲过。

1977年,《陈毅诗词选集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,张伯驹立刻去新华书店买了一本,爱不释手,放在枕边,时常翻阅,借以回忆当年与陈毅在一起的时光。

红楼因缘周汝昌

提到周汝昌,大家都知道他是红学大家,其实,周汝昌的爱好与研究广泛得很,诸如中国古代文学、文艺理论、诗词笺注鉴赏、书法、史地、语言、音韵等,而

他真正的爱好与专长是在诗词上。

周汝昌,字玉言,1918年4月生于天津,2012年5月逝世于北京,曾任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、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辑、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等,著有《红楼梦新证》、《曹雪芹小传》、《红楼小讲》等多部学术论著。

介绍了周汝昌,我们就来讲他与张伯驹的关系与交往,他们的交往可以说是一位红学泰斗与词坛大家的交往。而这交往的缘起,也正始于红学研究,始于张伯驹曾经的住宅承泽园,也叫展春园。所以,周汝昌先生曾说过:“日后有写红学史的,应该对张先生和承泽园的旧事辟一小小专章……”今天,我们就试着完成这个小小专章。

那时正是1947年,张伯驹任燕京大学中文系文法教授,而周汝昌正在燕京大学求学。一天,周汝昌看见两个人从贝公楼里出来,男的50岁上下,高挑身材,穿着长衫礼服,颇具风采;女的颇为年轻,打着一把阳伞,光彩照人。周汝昌觉得,这种风度翩翩、儒雅风流的人不像是燕园中人,后来得知,这就是张伯驹夫妇。

1948年农历十月,张伯驹在燕京大学中文系二楼举办自己收藏的书画精品展览,其中有一幅曹寅的《楸亭图》,还有一幅纳兰性德的小照。当时正在撰写《红楼梦考证》的周汝昌知道这一消息后,立即前往观看。他看到《楸亭图》四围绫边上,名字题咏已无空隙,这当中首先是藏主张伯驹的《贺新郎》一词,词句中涉及“红学”旧学贾宝玉即纳兰一义。于是,周汝昌一时乘兴,步韵连和了两三首词,每句下都有注释,句句讲曹家的史迹实事,暗暗纠正向来被误认的宝玉即纳兰之说。

张伯驹看了周汝昌的和词,非常惊喜,认为少年学子文笔不凡。于是,张伯驹传话要会一面。但见了周汝昌,不善言谈的张伯驹也没说几句话,只是把自己的《丛碧词》送给周汝昌一本。周汝昌毕恭毕敬接过来后,如获至宝,回校后反复读了数遍,非常赞赏,但也在音律上提出了70多处意见,一一标注在《丛碧词》上,又送还请张伯驹过目,张伯驹从善如流。于是,周汝昌越发钦佩张伯驹了。从此,他们开始了交往。

当时张伯驹所住的展春园离燕京大学不远,每天下午,周汝昌都去张伯驹家里坐坐,因为那儿是书画之府、丝竹之乡。入厅后,周汝昌便自寻座位,因为熟了,宾主常是不交一言,如同家人,也没有客套俗礼。宾主双方就这样互相信任,超脱世俗。周汝昌由此认为,张伯驹为人坦荡超逸,潇洒天真。他们的友情就在这平凡的相处中不断加深,张伯驹把周汝昌视为词学知己,而周汝昌则在这里感受传统文化的光辉。

不久,《丛碧词》增订排印,周汝昌便为该书写了跋文,其中提出:“如以词人之词而论(有别于诗人之词、文人之词、学人之词、杂流之词),则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,而以先生(指张伯驹)为殿——在他之后,恐怕不易再产生这种真正的词人之词了。”此语一出,当时文坛上正如周汝昌所说,“众老先生闻之,颇讶狂言,不无讥议”。

《丛碧词》连制三次版,周汝昌就作了三次跋。周汝昌是从学术、文艺上从公论断,并无丝毫阿谀献颂之心,这使张伯驹非常感动。日后,张伯驹将此记于《无名词》自序中,他写道:“……自三十岁学为词,至庚寅后二十几年,有集《丛碧词》。周玉言君跋云,词以李后主始,而以余为殿。此语一出,词老皆惊,余也汗颜,而心未尝不感玉言也……”张伯驹从此凡作词,必送周汝昌先看。有一次周游大觉寺,张伯驹坐在玉兰花下,袖出一词让周汝昌看,两眼却全神贯注地看着周汝昌——看他读词时的“面部表情”。

(未完待续)